

兔本生故事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月兔形象的建构

杨荣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要

中国月兔形象经历了从本土月精到融合外来元素的本土化演变过程。关于月兔传说是否源于印度, 学界存在“印度输入说”与“本土起源说”之争。本文综合考古实物、甲骨文字、文献记载等多维证据, 论证月兔观念实为中国本土自古有之的文化创造。兔本生故事自三国时期开始汉译传播, 至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始见“寄之月轮”的情节。在此影响下, 中国月兔形象完成了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存在到主动行动、从长生意涵到布施精神的深刻转变。宋代“菊道人”听经坐禅、明清“兔儿爷下凡济世”等故事, 生动体现了外来思想与本土信仰的有机融合。这一演变过程既印证了中华文化的本土根基, 也展现了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消化能力。

关键词

月兔传说, 兔本生故事, 本土起源, 形象演变

The Rabbit Jātak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genous Moon Rabbit Image

Rongjing Ya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26; accepted: October 1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The Chinese moon rabbit image underwent an evolution from the indigenous moon spirit to a localized form integrating foreign elements. Regarding whether the moon rabbit legend originated in India,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long debated between the “Indian origin theory” and the “indigenous origin theory.” Drawing on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from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textual recor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oon rabbit concept was in fact an indigenous cultural creation of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rabbit Jātaka began to be

translated and disseminated in China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nd the motif of “entrusting it to the moon” first appeared in Xuanzang’s 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Under this influence, the Chinese moon rabbit image underwent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from passive existence to active agency, and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longevity to the spirit of giving. Stories such as the “Chrysanthemum Daoist” listening to sutras and sitting in medit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Lord Rabbit descending to save the worl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ividly embod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oreign thought and indigenous belief. This evolutionary process not only confirms the indigenous found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its capacity to embrace and assimilate foreign cultures.

Keywords

Moon Rabbit Legend, Rabbit Jātaka, Indigenous Origin, Image Evolu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发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将兔子与月亮联系在一起的文字记录，但“顾菟”究竟指兔还是蟾蜍，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关于“月兔”观念的来源，学界历来存在争议：闻一多训诂考证认为“顾菟”本为蟾蜍，月兔乃后世讹变；季羨林则从比较文学视角提出“印度输入说”，认为中国月兔观念源于印度《梨俱吠陀》及佛本生故事；萧兵等学者结合汉代画像与文献，主张“蟾兔同生”，月兔观念在战国已然存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考古实物、文字训诂、佛经翻译等多重证据，论证月兔传说的本土起源，并系统考察兔本生故事传入后中国兔子形象的演变轨迹，揭示中华文化本土根基之上容纳、消化外来元素的过程。

2. 对月兔传说本土起源的多维论证

对于“月兔”观念是否是中国本土原生的文化，学者们有不同的答案：

从考古实物来看，河南安阳王裕口曾出土一对商代兔形玉佩，外轮廓接近半圆，叶舒宪在《玉兔神话的原型解读——文化符号学的N级编码视角》中认为这很明显就是在模拟月亮的形象。在叶舒宪看来，商代玉兔与当时的玉蝉、玉蚕、玉蛙等器物一样，都是对月亮崇拜的衍生[1]。

尹荣方则是从甲骨文中“兔”和“婁”的字形字义进行分析，认为古人本身就对兔子的生殖十分关注，而兔子每月一孕的生育特性也很容易让古人将其与月亮联系起来。月亮崇拜本身就蕴含着古人对女性生殖崇拜的内涵，“月兔”观念自然也就应运而生[2]。

钟敬文从中印月兔传说内容、月兔形象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节点等方面对“印度传入说”进行了批驳，认为在西汉时期月兔传说就已经十分流行，而佛教有关兔子的故事则是在这之后才真正传入中国。

除了上述角度的论证外，也有学者从梵语词源的角度来回应“印度传入说”。有学者在论述月兔故事起源的时候指出，印度本身就有与“月兔”关联的词汇，例如梵语中的月亮有时候用 śaśin 这个词来表示，而 śaśin 又是 śaśa (兔子)加上语尾(in, 指具有者)构成的，于是从字义来看，月亮又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兔子的东西”。根据庄国彬的研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白螺奥义书》，而这部奥义书成书时间大致在

公元前三、四世纪，与中国最古的证据年代大致相近[3]。这说明印度本土也存在独立的月兔观念，因此既不能简单将中国月兔传说的来源归于印度，也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月兔观念一定是从印度传入的。

如果说词源考证只能说明印度也有独立的月兔观念，那么汉译佛典的梳理则能提供更直接的时间线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汉译兔本生故事直到三国时期才出现。最早载有《兔王本生》故事的是三国吴康僧会所译的《六度集经》，故事讲述了狐、獭、猴、兔四兽供养一个修道人，另外三个动物都为其找到了食物，兔子却选择了供奉自己，投入火中，意在传递佛教舍身布施的观念。在这个故事中并没有提到月亮，自然也没有体现兔子与月亮的关系。当时译经以直译为主，若无特殊原因，译者一般不会对原典情节做大幅删改。据此或可推测，印度原典中的兔本生故事，在当时也尚未与月亮情节明确结合。当然，这一推测仍需更多文献佐证。

在汉译佛典中最早体现月兔观念的，是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同样是兔子舍身布施，《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却是狐、兔、猿三个动物在林野共同居住，帝释天为了检验他们的修行，化身老者请求布施，兔子感叹自己没有可以布施的东西，于是投入火中，老者恢复帝释天的身份，收殓兔子的遗骸，对狐、猿说：“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于是“月中之兔，自斯而有”[4]。在这之后的几版兔本生故事，都沿用了这一说法。

本生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吸收各地的地域文化元素。在西汉就盛行的月兔观念，三国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却并未体现，而之后唐代玄奘的版本却刻意提及“寄之月轮”，这或许说明唐以前的兔本生并未受到“月兔”观念影响。尽管仅凭现存汉译文献很难确证印度本土何时将月兔观念与兔本生故事结合，但月兔观念的“印度传入说”同样难以仅凭现有材料坐实。

3. 兔本生故事的汉译与传播

兔本生故事属于佛教本生经体系，是记录佛陀前世修行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情节为兔王为了供养修行的仙人，主动投身火中牺牲自己，其高尚的布施德行感动天帝，天帝将其形骸置于月宫之中，让后世众生瞻礼。这一故事随着汉译佛典的传入进入中国，逐渐与本土已有的月兔意象发生融合。

司志武曾梳理唐宋及以前 15 个版本的兔本生故事，认为《六度集经》与《旧杂譬喻经》同源，《生经》《撰集百缘经》《菩萨本缘经》《菩萨本生鬘论》可能源自更原始的经书，其中《生经》是现存汉译文献中较古的版本，《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和《杂宝藏经》则是后期产生的故事[5]。而在这几个早期的汉译兔本生故事中，主要以“舍身布施”为核心，都未曾提及兔子和月亮的联系。

司志武并未对《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版本进行过多的论述。实际上，《大唐西域记》的版本与巴利文《本生经》所载版本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二者都描述了帝释天寄兔子于月亮之上的情节。不同之处只在于，巴利文《本生经》中帝释天复活了兔子，而《大唐西域记》则没有这一情节。这一共同点说明，“寄兔于月”并非汉地本土的附会，而是印度佛典中已有的情节，不过，仅从汉译兔本生故事中并不能明确这一情节出现的具体时间。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这几个版本的《兔本生故事》实际上都表达了同样的主旨：因果报应、舍身布施。

4. 兔本生故事对中国月兔形象建构的影响

尽管屈原的“顾菟在腹”常被视作兔子与月亮发生关联的早期证据，但中国本土文献中兔子形象与月亮神话的明确结合，实际上要到两汉时期才真正出现，在此前漫长的时段里，兔子除了作为静态的祥瑞符号之外，在各类故事中基本是以其本身的动物形象出现的。《庄子》中的“得兔忘蹄”、《韩非子》的“守株待兔”都是在借用兔子这一具体动物形象来承载其哲学思想。

两汉时期,兔本生故事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并未与本土故事产生互动。早期传入的兔本生故事并没有“寄月之轮”的故事情节,但本土已然出现了一些月兔传说,兔子的神话形象也多与长生等祥瑞意象相关联。“玉兔捣药”的经典形象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西汉《汉乐府·董逃行》有云:“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药可得神仙。”此时兔子的形象已然转变为制作不死药的仙使,并开始抽象化。

与此同时,两汉时期产生的月亮神话对“月精”的具体指向还有些模糊,但已有了明确的对象:嫦娥、蟾蜍与兔子。东汉高诱注《淮南子》称“姮娥,羿妻也……奔入月中,为月精”[6],张衡《灵宪》却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同时《灵宪》中又提及“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7]。可见月兔与月蟾在这一时期经常混融。

如果说两汉时期月兔在神话中尚未获得独立的道德意涵,西晋傅玄《拟天问》则是将兔子升格为给人间赐福的神灵:“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这时的兔子不再只是给西王母制作不死药,而是有了赐福黎民百姓的能力。

可以说,隋唐以前本土的月兔形象就已经十分丰富,但是与本生故事中的舍身布施、菩萨行的情节没有多少联系。

隋唐时期,月兔被引入阴阳五行这一解释系统,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指出“卯为兔、獬豸者,兔,阳虫也,居月中者,阴怀阳也。”[8]。同时月兔的长生内涵被延续下来,兔在月中捣制不死之药的形象在隋唐不断被强化,“玉兔捣药”成为月兔最广为人知的一项职能。同时,月兔与月蟾开始分化,唐代诗文中的“蟾宫”“蟾蜍”开始大量用作月亮的代称,较之于仍有捣药长生具体职能的月兔,月蟾的符号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而兔本生故事到玄奘《大唐西域记》才开始引入“月兔”概念,《法苑珠林》引用这一解释并不断强调,使兔子“舍身入月”的形象在当时成为了论述月兔起源的解释之一。佛教月兔形象的引入,使这一时期形成了本土月兔形象与佛典解释并行的双重结构,为宋代以后月兔形象的进一步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月蟾已然退居为月亮代称,月兔则逐渐成为月宫叙事的唯一主角,月兔从与月蟾并列走向独立。与此同时,兔本生故事中的布施精神被转引和消化,月兔的本土形象开始与舍身内涵相交织。在佛教知识中,兔本生故事以其“舍身布施”的核心叙事,成为佛本生故事的重要案例。宋代虽然没有直接以布施内涵为核心的兔子故事,但民间已经出现了以兔子为主角、体现佛教“众生皆有佛性”观念的故事。宋代陶谷《清异录》中曾记载:“毫社吉祥僧刹,有僧诵华严大典,忽一紫兔自至,驯伏不去,随僧坐起,听经坐禅,惟餐菊花,饮清泉。僧呼‘菊道人’。”[9]这里的兔子不仅主动前来听经,还被人为赋予了“道人”名号,很明显是佛教“众生皆有佛性”思想的体现。可见宋元时期,月兔一方面从与月蟾并列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开始与佛典舍身内涵交织,为明清时期的彻底融合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佛典兔本生故事与本土月兔叙事的融合更为显著,出现了将兔本生故事重新叙述为民间故事的现象。清代顾景星的《白茅堂集》记载“兔王舍身供养修行者,后被挂于明月宫,年年饲天狗”[10]的故事就是很明显地将佛教本生故事民间化、情节化的表现。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月兔起源考证的文章,明代周婴在《卮林》中对历来诸多月兔起源进行了考证,对兔本生故事持保留态度,评价兔本生故事中的情节“事尤鄙俚”[11]。

兔本生故事中月兔舍身布施的精神被本土月兔形象吸纳后,又被民间世俗化,与本土的月兔崇拜相结合,形成了“兔儿神”的民间信仰。传说中玉兔曾下凡为百姓消灾治病,灾后百姓感念他的恩惠,塑像祭祀,称之为“兔儿爷”或“兔儿神”。清代开始有中秋拜兔儿爷的习俗,文献中却少见兔儿爷的传说故事,这一传说很可能是习俗形成之后,民间在佛教慈悲济世理念影响下赋予的解释。如今,玉兔下凡消灾济世也成为了其多元形象的一个重要构成。“兔儿神”的形象,既带有中国本土月兔的身份,又怀有

佛教普渡众生的慈悲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本土信仰与佛教思想融合的产物。

综合来看，隋唐以前，本土月兔形象已十分丰富，涵盖月精、捣药、望月而孕、祥瑞等多重意涵，但与本生故事中的舍身布施、菩萨行尚无关联。唐代《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将兔本生故事中的“舍身入月”引入本土，月兔始获布施精神这一新内涵，形成本土月兔与佛典解释并行的双重结构。宋元时期，兔本生故事被广泛转引与消化，布施精神与本土长生意涵开始交织，民间也出现了“菊道人”听经坐禅等受佛教影响的兔子故事。至明清，兔本生故事被民间化重述，月兔从静态月精符号演变为具有独立人格与行动能力的故事角色，舍身布施精神被世俗化为报恩、济世、赐福等民间伦理，最终与本土月兔形象彻底融合，形成以本土根基为主、多元意涵并存的中国月兔形象。

5. 结论

月兔观念为中国本土原生的文化创造，而兔本生故事中的月兔观念源于印度，二者本属两条独立路径。兔本生故事自三国时期传入后，至唐代《大唐西域记》始见“寄之月轮”情节，为中国月兔形象注入了布施精神与行动性；至明清时期，二者彻底融合，形成以本土根基为主、多元意涵并存的复合形象。

在这一融合过程中，历代兔子形象呈现出明显转变：形象从单一到多元，行为从被动到主动，内涵从长生扩展为长生与布施兼具。这种变化并非外来思想对本土传统的替代，而是外来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本土兔子形象特征始终留存，外来文化起到的作用是增添新意涵，使之更为多元、传播更广。

这一演变过程表明，中华文化对外来元素的吸收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在保留本土根基前提下的创造性转化。月兔始终居于月宫，玉兔捣药的传统意象绵延不绝，正是“和而不同”文化逻辑的体现。与此同时，本土月兔形象自身也在演变。月兔与月蟾由汉代的混融，经唐代的分化，至明清月兔成为月宫叙事的唯一主角。本文对月兔与月蟾混融时期的具体形态讨论尚不充分，民间兔子形象的多元面貌也有待更细致地梳理，这些将是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推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玉兔神话的原型解读——文化符号学的 N 级编码视角[J]. 民族艺术, 2014(2): 32-37+44.
- [2] 尹荣方. 神话求原[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18.
- [3] 庄国彬. 月兔故事再议[J]. 圆光佛学学报, 2014(24): 33-53.
- [4] (唐)玄奘, 译. 辩机, 撰. 《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卷第七[M]. 高丽藏本, 5-6.
- [5] 司志武. 汉文佛典中兔本生故事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 30-32.
- [6] (汉)刘安, 撰. (东汉)高诱, 注. 《淮南鸿烈解》淮南鸿烈解卷六 览冥训[M]. 四库全书本, 14.
- [7] (东汉)张衡, 撰. (清)马国翰, 辑. 《灵宪一卷》灵宪[M]. 光绪九年婁嬛馆刻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3-4.
- [8] (隋)萧吉, 撰. 《五行大义》卷五[M]. 清嘉庆九年刻本, 37-38.
- [9] (北宋)陶谷. 兽[M]//清昇录. 隆庆六年(1572)叶氏蓁竹堂刊本, 73.
- [10] (清)顾景星, 撰. 《白茅堂集》卷四[M]. 康熙刻本, 11.
- [11] (明)周婴, 撰. 《卮林》卮林卷四 述洪[M]. 四库全书本, 35.